

中国古代 写作学概论

李道荣 著



文心出版社

(豫)新登字 08 号

中国古代写作学概论

李道荣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4.875 印张 297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37-482-1/I·12

定 价 14.00 元

序

王先霁

写作，是文明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的能力，是保证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写作，就是用书面形式传达思想情感、传播信息。人类创造文字，就是为了用它来写作，并由此而将所获得的知识、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种种信息，物化在系统化的符号之中，从而能向别人，向百里千里之外的人，向百年千年之后的人传送。写作是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交流方式、交际手段。没有写作，人类的经验难以积累，许多现在看来普通的事，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从头学起，社会就将长期停滞落后。作为社会的积极成员，要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而写作能力不可能由先天遗传，只能靠后天习得。所以，写作能力的训练，是各级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写作规律的探求，对写作方法与技巧的研究，则是写作学科的基本任务。李道荣同志在高等学校主讲写作课已届十年，对写作学持续地作深入研究，已有多种著述问世。我最早看到的是他的文学评论文章，表现出真诚的热情和敏锐的悟性；其后看到的理论文章，表现出思考的深度。现在，摆在面前的二十八万言的《古代写作学发展概观》，是他多年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总结，是他在写作学上的开拓，是一项令人欣喜的新成果。

写作，从横的方面说，有民族的语种的差异，用不同语种的文字写作，会有某些特殊的要求。比如，汉字是独体，一个字笔画有多有少，相差可以很远。“字形单复，妍媸异体”，讲究的人，把笔画多和笔画少的字错开来。“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黪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文心雕龙·练字》）用汉字写作，讲究形文之美，这对用拼音文字写作的人是无须考虑也无从考虑的。写作，从纵的方面说，还有时代的差异。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与人交流的内容和手段变化，写作也必然随之变化，文章的类别、体式，语言表达方式，乃至写作劳动的操作方式（在龟甲上刻、用毛笔写在纸上、用电脑），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后代的写作是前代写作的继承与革新。为了透彻地研究现代写作，除了需要研究现代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对写作的影响之外，还要研究现代写作由之出发的本民族的传统。后一方面乃是被忽略的薄弱环节，从这个角度说，本书的出版，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写作理论，有的作为思想的化石记录历史前进的足印，有的则仍富于生命活力而继续给我们启迪。本书第一章介绍了“修辞立其诚”的思想，第三章更详细阐释了元好问“不诚无物”的论断，这就是中国古代写作学的精萃之一。中国古代写作学，也如其他许多门类学说一样，十分重视与伦理学的关系，把作文与做人密切联系在一起。本书第四章的“人品论”对此有更全面细致的评述，强调人品的

重要，也注意到人品与文品并非绝对一致，并且注意到不同体式作品中二者关系的不同情况。象这些分析，很能开阅读者的思路。

本书作者是大学文学专业出身，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实践又是他之所爱和所长，或许正因这样，本书偏向于文学写作。此后，如果对古代应用写作理论作更广泛的发掘介绍，将能满足更多方面读者的不同期望。

我匆匆浏览书稿，深感材料丰赡，条理清晰，辨析深入，文笔畅达。写出上面的话，只是仓促之间的随感；认真细读只有留待他日了。祝愿道荣同志的研究继续取得新的成果。

1993. 4. 12

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代写作学的萌芽期(先秦两汉)	(1)
第一节 萌芽期写作理论概观	(3)
一、文章功用	(3)
1.言志与发愤	(3)
2.美刺与经世	(5)
3.立言与不朽	(8)
二、语言要求	(9)
1.崇质尚简	(9)
2.立象尽意	(12)
3.妥帖易晓	(14)
三、写作法则	(16)
1.修辞立诚	(16)
2.文各异面	(17)
3.寻矩遵规	(19)
第二节 萌芽期写作研究特点综论	(23)
一、以文章功用为中心	(23)
二、零散直观的原则	(25)

三、多位一体的混沌	(28)
四、从多元走向一尊	(30)
 第二章 古代写作学的形成期(魏晋南北朝)	(32)
第一节 形成期写作理论概观	(34)
一、过程论	(34)
1. 准备阶段: 才气学习与感物入兴	(34)
2. 构思阶段: 神思应感与命意谋篇	(41)
3. 表述阶段: 熔裁通变与情经辞纬	(48)
二、文体论	(73)
1. 文体分类: 文笔之分与本末之辨	(73)
2. 文体写作: 才有所偏与敷理举统	(77)
三、价值论	(84)
1.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84)
2. 恢万里而无阂, 通亿载而为津	(86)
3. 吟咏情性, 感荡心灵	(87)
4. 穷则独善以垂文, 达则奉时以骋绩	(89)
四、发展论	(90)
1. 文体: 情数运周, 随时代用	(90)
2. 语言: 踵事增华, 变本加厉	(93)
3. 底因: 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95)
五、鉴赏论	(98)
1. 情动辞发与披文入情	(98)
2. 操曲晓声与先标六观	(99)

第二节 形成期写作研究特点综论	(101)
一、学科体系的正式构筑	(101)
二、本体研究的纵深挺进	(105)
三、面向实践的理论趋赴	(111)
四、形式的侧重与宗经的偏颇	(114)
第三章 古代写作学的发展期(隋唐宋金元)	(118)
第一节 发展期写作理论概观	(120)
一、写作源流	(120)
1.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	(120)
2.读书与交游	(124)
二、主体修养	(135)
1.不诚无物与文如其人	(135)
2.修身正心与贫贱不移	(139)
三、文本传达	(143)
1.入门须正	(143)
2.文以明道	(150)
3.创意造言	(157)
4.得心应手	(164)
四、文章形神	(169)
1.文气说	(169)
2.形神观	(175)
3.意境论	(181)
4.风格辨	(189)

五、法度技巧	(198)
1. 悟入与活法	(198)
2. 章法与句法	(201)
3. 修辞手法	(206)
第二节 发展期写作研究特点综论	(211)
一、倡发追逐诗文革新运动	(211)
二、转向操作的技法研究	(213)
三、相关理论的借鉴融合	(218)
四、研究方式的灵活多样	(221)
五、以道论文的滞涩与以禅喻诗的飘渺	(224)
 第四章 古代写作学的成熟期(明清)	(229)
第一节 成熟期写作理论概观	(232)
一、发展论	(232)
1. 源流论: 诗之为道, 相续相禅	(232)
2. 正变论: 正有渐衰, 变能启盛	(240)
3. 创新论: 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	(246)
二、主体论	(264)
1. 人品论: 人品为先, 文章次之	(264)
2. 才识论: 识为体, 才为用	(275)
3. 情感论: 情之至者, 文未有不至	(285)
三、本体论	(302)
1. 立意: 意在笔先与意随笔生	(302)
2. 辨体: 体欲其辨与用欲其神	(311)

3. 用料: 体物著情与使事用典	(325)
4. 结构: 首尾开合与意脉贯穿	(335)
5. 语言: 炼字炼句与炼意炼格	(351)
6. 修改: 不改不工与不可多改	(363)
7. 境界: 意与境浑与入内出外	(371)
8. 风格: 阳刚壮美与阴柔优美	(385)
四、人物论	(396)
1. 真实论: 人事皆假与情理俱真	(396)
2. 性格论: 同而不同与一百八样	(404)
3. 运思论: 临文动心与代人立心	(412)
五、文法论	(418)
1. 法与不法	(418)
2. 为文大法	(430)
3. 写作技法	(436)
第二节 成熟期写作研究特点综论	(448)
一、历代理论的整理与综合	(448)
二、融入新机的批判与创新	(450)
三、文体研究的深入与细密	(454)
四、理论的系统与方法的更新	(459)
五、宏观审视的欠缺与过程把握的薄弱	(464)

第一章 古代写作学的萌芽期

(先秦两汉)

先秦两汉时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初创演进期，各种学术文化混为一体，互相扭结。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写作学和其它学科一样，在整体的学术文化的母腹里，只能处于萌动育形阶段。这时期的写作理论，基本体现为写作观念的微观积累，它还没有摆脱对其它学术文化的依附而获得独立地发展，也不具备纯正的理论形态。具体来说，这时期的写作理论与作者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观点联系过密，它往往表现为作者的政治主张、道德意识、哲学观念的演绎与注释，带有鲜明的政治教化的印记；由此也反映出作者对本体的写作研究自觉意识的缺乏，在先秦两汉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除汉代《诗大序》和王充的《论衡·超奇》篇较有系统外，这时期还未出现系统的独立成篇的写作研究的专论，其论述基本上为片言只语；这些片言只语触及到写作的一些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大多为感性直观的写作的外部规律，并且缺乏理论的自洽性与系统性。因此，我们只能说先秦两汉的写作理论是中国古代写作学的萌芽期。

先秦时期的写作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诗、书而发，这时期的写作成就主要体现于《诗经》、《楚辞》，各种历史文献如《尚书》、《春秋》、《左传》等和诸子散文上。这时期的有关写作理论全部为写作观念的缀合，它们散见于诸如《尚书》、《左传》、《周易》、《楚辞》和诸子文章中，尤其为儒、墨、道、法四家的文集。两汉时期由于辞赋的兴盛、《史记》《汉书》的涌现、各种朝廷公文日趋正规以及经学的发达，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对辞赋、史传文、论说文、应用文和《诗经》、诸子文章的关注研究上，并开始走向写作经验的初步总结，表现出从写作观念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意识努力，其研究成果主要见于《毛诗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和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等著作的有关篇章中。

总的说来，先秦两汉写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写作功用的重视和语言要求的论述，由此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写作原则，这是由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先秦时期，诸侯争雄，互相攻伐，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各国统治者（诸侯）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计，急需在言辞、文章中谋求治国强国的措施；此后，天下统一，统治者为维护巩固封建统治，也要求写作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成为强化自己统治的工具；因此，写作功用在这时期的理论研究中，便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作为写作的物化形态的语言也便围绕其实际功用而展开讨论。

第一节 萌芽期写作理论概观

一、写作功用

1. 言志与发愤

“言志”说是先秦两汉写作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观点。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首先提出“诗言志”，在此之后，先秦两汉便不断重复着这个命题，比如“诗以言志”，“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诗者，志之所之也。”什么是“志”呢？唐代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现代学者闻一多在《歌与诗》中考证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最初，“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也有类似考证：“志”原来与“意”、“情”是同义词。既然“志”是“怀抱”，是“意”“情”，那么，“诗言志”就可理解为诗歌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感情。不过，这是后来的解释，实际上，汉代的《诗大序》已明确指出“志”、“情”都是心灵世界的东西，“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就是说，“心”“中”的“志”“情”是诗歌产生的内驱力，反过来说，诗歌便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与表现。

人的思想感情一旦产生，必然要求用一定的媒介物予以传达抒发。《诗经》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心之忧矣，我歌

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心中产生了忧虑、哀愁，便通过歌谣的方式予以抒发。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认为：“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劳苦倦极，疾痛惨怛时之所以要呼天唤母，显然是为了缓解心理的压力与调节生理的失衡，现代心理学、生理学已证明了此点。

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文章、言辞在反映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同时，还有疏导、抚慰、平衡人的思想、感情、情绪的作用。屈原在《离骚》中说：“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所以他要“结微情以陈词”。屈原在人生去留问题上是有过一番激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这在《九章》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一方面，“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他希望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阐明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社会的黑暗，政治的污秽使他“忧心不遂，斯言谁告”；于是，另一方面，他在“志沈菀而莫达”的情况下，不得不退落到“道思作颂，聊以自救”的境地，极力想通过赋诗来抒发排遣心中郁积的愤懑与不平，以此获得内心的平衡与精神的自救。于是便有了《九章·惜诵》开篇的名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中“发愤”与“抒情”说的最早的源头，对后来写作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在解说屈原的写作动机时十分注意这一点。如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认为屈原作《离骚》，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于是“忧愁幽思而作《离

骚》”。并且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还认为古代圣贤之所以进行写作活动，是因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还说过，自己受辱后，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是写作活动支撑了他生活的信念，决心要像古人那样，“发愤著书”。这就表明，人在现实世界中遇到挫折磨难，内心愁苦郁结之时，还可借文章来抒发郁积的思想感情，在写作这种精神活动的天地中求得情感的释放与精神的抚慰。

2. 美刺与经世

孔子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①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诗歌的功能作用。

不过，在先秦两汉的写作理论中，相对文章的其他功能，人们最为重视文章的政治作用，并把之提高到国家兴衰治乱的高度来认识。先秦时期，有“审乐以知政”的说法，后来《诗大序》、《汉书·艺文志》在论述诗歌的作用时，也把乐理移置到诗理之中，认为诗歌同样具有反映现实的特点，故王者可以用之。“观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大序》还把诗歌的功用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它要求诗能介入现实的政治生活并发生影响，要求诗歌有“怨刺”的思想内容，“下以风刺上”，以此让王者通过诗歌来考正自己的功过得失。当

^① 《论语·阳货》。

然，这只能作为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古代统治者能否具有这种自知之明，闻过则改的精神是大可怀疑的。但是，统治者对文章的政治功用是充分意识到了的，并对之加以规范利用，作为自己统治的工具。荀子在《乐论》中说得十分明白：“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导），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忍……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十分清楚，统治者对文章的思想感情是有他们的政治要求的。他们企求用《雅》《颂》之类的声音为自己歌功颂德，用符合他们政治标准的规范化了的思想感情的诗歌来“上以风化下”，以此“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①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诗大序》虽然主张诗歌要有“风刺”的内容，但是它又强调必须有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从统治者方面说，要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宽容大度的胸怀和闻过则戒的品德；从诗歌作者方面讲，要“主文而谏”，也就是说，言辞要委婉含蓄，不直言统治者的过失，不触怒统治者的尊严，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显然，这两方面的前提条件是很难达到的，特别是统治者一方。如按照《诗大序》的写作要求去讽谏统治者，诗歌的批判怨刺锋芒在经过多方缠绕包裹后，便成了银样蜡枪头，甚至成为为统治者搔痒的工具，汉代出现的大量“欲讽反劝”的辞赋，显然是这种理论在写作实践上的运用。

① 《诗大序》。

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这样，诗歌的怨刺作用便让位于以美颂为主。

较之于诗歌的美刺教化作用，一般实用文章如史传文、论说文、诏策奏疏类的公文的政治功用更为突出。诗歌毕竟是以形象为主的，它为政治服务是要通过形象转化和读者的情感移置的中介来实现的，而一般实用文章则能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权建设。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认为史传文的作用是巨大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认为奏疏类的公文是政权机器运转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这就是说，奏疏类的公文能够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处理政事，解除当权者的烦恼忧难，使政务工作得以正常进行。王充以周长生为例，说他在州里替刺史任安起草章奏，在郡里为太守孟观上书的时候，是“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而周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徵旨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不过，在王充看来，在当时所有文体中，论说文的价值最大，其写作难度也最大，他在《论衡·佚文》中说：“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今、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之人所能为也。”这样的文章一方面能“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辨析宣传真理；另一方面，又能“极笔墨之功，定善恶之